

中国式现代化与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

倪 星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在治理逻辑上借鉴了各国现代化实践中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重大创新和超越，形成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四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执政党坚强有力、引领创变，政府积极进取、开明有为，市场创新开放、灵活有效，社会积极参与、和谐有序，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深圳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绝佳样本。在深圳改革开放实践中，通过有力政党指引发展方向，有为政府打造一流营商宜居环境，有效市场实现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有序社会助力共建共治共享，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深圳先行示范区；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1-0005-06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作为一个从匮乏到丰裕、从混乱到有序、从野蛮到文明的变迁过程，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等内容，一直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世界各国人民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具体条件，独立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共同丰富了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样式。中国走向现代化更是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独一无二的重大事件。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与近代以来屈辱沉沦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苦苦求索，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为罕见的历史变革。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确定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梦的实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触手可及。

现代化理论肇始之初是以西方社会形态为标准进行抽象和定义的，立基于欧洲现代国家的构建逻辑。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言，西欧的国家构建建立在资本强制基础之上，以货币经济为媒介

的资本力量为国王扩大权力提供了媒介，也为资产阶级与国王进行交易和限制王权提供了基础^[1]。因此，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下，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公民社会的多元参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动力，成为指导和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唯一价值、制度和行为模式。在已有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可以被解释为一个资本形成的过程，包括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要素，并形成了以英美为代表和以东亚为代表的两种典型发展模式。其中，在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中，主要强调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政府更多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在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中，强调将政府带进来，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以赶超为导向，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东亚模式中虽然政府高度介入并主导现代化进程，但以资本为导向的模式并未实质改变，以英美为模板的赶超型发展并未内化为自身的领先地位。

作为摆脱西方道路的一种尝试，苏东模式将政党带进现代化进程中，扩展形成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大要素。苏联和东欧国家试图以政党对政府、市场和社会进行统合，通过全能型政党建立计划经济和总体性社会。虽然苏东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宣告失败，但其失败并非努力将政党带进来的问题，而是苏东国家单纯试图以政党逻辑取代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并未有效理顺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

现代化模式中的要素配置

	政党	政府	市场	社会
英美模式	-	-	+	+
东亚模式	-	+	-	-
苏东模式	+	-	-	-
中国模式	+	+	+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位于东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快速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和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和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

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发达国家还从未面对过像中国这样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因其超大规模、复杂结构和巨变幅度，理所当然站在了世界现代化舞台的中央。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局面，既广泛吸取了各国现代化的优点，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创新和超越。与英美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注重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与东亚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重视产业政策等政府作用，但更注重政党引领与和谐社会建设。与苏东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政党的领导地位，但同时重视党政分工合作，尊重市场规律，引导社会多元参与。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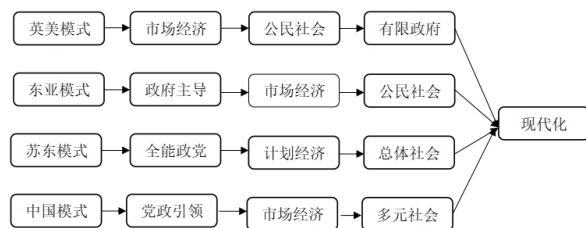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现代化的四大模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

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模式是英美模式、东亚模式、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在英美模式中，强调市场的先发力量，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发育，

推崇有限政府。在东亚模式中，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官队伍，采取明智、审慎的产业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苏东模式中，强调政党的领导地位，由列宁主义政党垄断所有权力，打造全能型政党，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社会上呈现出总体性社会的模式。很显然，英美模式重视自由市场和公民社会，是一种古典的现代化模式，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的发展。即使是英国和美国，也早已抛弃小政府的传统做法。东亚模式在英美模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主张将政府带进来，将政府角色置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心，提出一种发展型政府理论，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为后发展国家快速实现赶超探索出一条新路。但东亚模式基本上是在较小规模经济体中出现的，不适于超大规模国家。另外，东亚模式在经济追赶阶段比较有效，而国家一旦完成了追赶任务，需要进行创新引领，则尚无成功案例。与上述两种模式不同，苏东模式主张将政党带进来，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打造出一个全能型政党，并将其置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实践证明，苏东模式有利于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统一，也有利于落后国家进行快速工业化，但并不适应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环境，因而逐渐丧失了竞争力。

作为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继承，中国式现代化承接了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大要素。作为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创新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更注意理顺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创新实践，进行区别性组合，形成了一种政党引领下具有结构化灵活性的韧性治理模式，政党坚强有力、引领创变，政府积极进取、开明有为，市场创新开放、灵活有效，社会多元参与、和谐有序，从而实现了理想化的治理状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其关键在于，一是突出政党在现代化中的核心和枢纽地位，发挥政党的战略领导力和核心引领作用；二是妥善处理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三是充分调动各要素内部的力量，做到政党有力、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以上各方面统筹联动，四

位一体，从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目标明确、领导有力、运转协调、韧性灵活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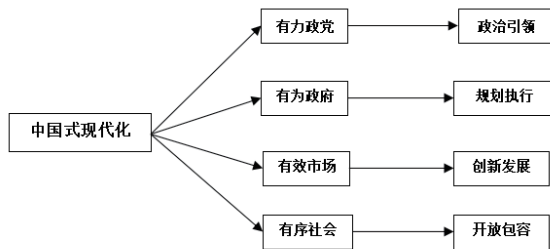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式现代化的四要素内容

（一）有力政党

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执政党坚强有力，引领创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通过顶层设计、高位推动、革命动员，引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展现出杰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

1. 政治领导。政治是统领一切的灵魂。政治领导力是党对各种政治力量、政治现象的正向影响力，主要体现为把控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及其运作效果。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政治领导力，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国家治理保持井然有序的状态。

2. 思想引领。思想就是力量。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党推进理论创新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抵御错误思潮的能力。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

3. 群众组织。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组织力是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能力，是党长期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发动群众、有效组织群众历来是党的政治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工作成效。

4. 社会动员。号角就是方向。党的社会动员力主要体现为党对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各方力量的动员能力，包括影响能力、动员能力、

引导能力和凝聚能力等。党强大的社会动员力是由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及作风和形象等决定的，是由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锻造出来的。

（二）有为政府

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政府积极进取，开明有为。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扮演了一种典型的发展型政府角色，强调专家治国，高效行政，采取亲市场政策，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主动进行战略规划，审慎开展宏观调控，积极维护市场，科学防控风险，确保了国家发展在国际环境巨变的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

1. 战略规划。清晰的目标、科学的规划，是取得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各级政府注重长期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规划，善于把握政治全局和政治方向，并注重政策推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中国规划体系中，优先确定远景目标、战略路径、五年规划和重大举措，进而实现地方规划与中央规划对接，部门规划对标总体规划，全国上下一心、全方位协同推进战略规划实施。

2. 宏观调控。中国政府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工具进行宏观调控，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保持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重管理预期和防控风险，从而保持总量平衡，实现宏观稳定已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取向，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3. 市场维护。政府行为的重心不是干预，更不是领导市场，而是维护市场秩序、疏通市场渠道、建立健全市场体系，修补市场失灵，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

4. 风险防控。各级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包括信息共享机制、沟通协作机制等，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风险防控有机协同联动。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提高了处置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建立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注重对重点领域重大风险的防

范和化解，切实加强了风险应对和化解能力。

（三）有效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市场创新开放，灵活有效。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资源均衡配置，要素有效流动，体制机制完善，创新创业活跃，极大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1. 资源配置。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步伐，打破行政性垄断，切实推动政企分开，使国有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多体现在资本层面，加快推进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多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确保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益得到同等保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强化创新激励。

2. 要素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特别是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推动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3. 体制机制。通过“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产权制度和资本市场制度更加完善，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市场监管机制、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及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日益完善，从而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价格机制对于生产要素配置的引领作用。

4. 创新创业。营商环境的优化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当前，中国市场主体已经达到1.0024亿户，标志着中国市场主体迈入“亿户时代”，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国，新产业新业态迅速增长，显示了中国

万众创业的市场活力。

（四）有序社会

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社会积极参与，和谐有序。中国大力建设包容型社会，各社会阶层秉承实用理性、开放包容、善于学习应变。

1. 开放包容。在当代中国，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合作，形成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和合作共治的善治局面。党和政府注重充分发挥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公民对所处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视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高公民自治能力，促进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发展。

2. 有序参与。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实现民主制度的重要维度。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当前，我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不断健全，参与的形式不断完善，参与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3. 共治共享。我国强调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党建引领是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现治理网络全覆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和谐稳定。与经济增长奇迹相伴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奇迹。改革以来，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全国范围内小康社会的建成，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安居乐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和谐的奇迹。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深圳先行示范

毋庸置疑，深圳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绝佳样本。在过去的40多年里，深圳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4]。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在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世界上赢得了“硬件硅谷”“科技天堂”等国际形象^[5]，成

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深圳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奇迹，打破了哈耶克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而最终必然‘通往奴役之路’的悲观论调，成为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要素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6]。换言之，深圳的转型发展与制度变迁可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体现，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西方道路，又不同于计划体制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中东欧转轨国家和拉美转型国家的‘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1. 有力政党，指引先行示范区的发展方向。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取得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悉心指导的结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为深圳的改革发展指明了航向。在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和重大历史进程中，党中央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非凡的气魄带领深圳人民不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深圳40多年的实践表明，必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始终保持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顶层设计深圳先行示范区蓝图，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指明了方向和路线。

2. 有为政府，打造一流营商宜居环境。政府搭台，经济唱戏。作为国内市场主体规模最大、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始终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近年来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迭代推出了营商环境1.0至4.0系列改革政策，从先行先试到全面落地，改革举措在全市“遍地开花”，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新变化。当前，深圳正在开启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改革，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构建国际接轨的开放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深圳各级政府抢抓先行示范区建设机会窗口，不断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按照中央的要求,争取率先基本建成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努力打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城市典范。

3. 有效市场,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高度市场化是深圳崛起的最关键因素。市场化的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创新资源的流动、配置及其功效的发挥,对于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技术知识市场、科技中介市场、创新成果市场及其法制保障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方面,深圳用仅占全国0.02%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2.6%的GDP。产业方面,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业、高端服务业、消费零售等领域的表现也格外抢眼,不断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增长持续提供新动能,孕育出华为、大疆等世界级企业。专利方面,深圳知识产权创造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10月,深圳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全国平均6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8年全国居首。

4. 有序社会,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在社会层面上,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深圳已深入人心。社区是社会的基座,更是城市的细胞。深圳以社区为单元,建立起了“一核多元”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发挥着领导、沟通、议程发起和利益协调等多重功能,借助协商平台,社区治理主体得以进行经常性、互动性和有效性的利益表达与妥协,进而实现利益的共识与综合。这种在基层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吸纳社会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营造出尊重个性、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最佳创新创业氛围,吸引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来深圳居住和创业,使得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密集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集聚地区之一。社会治理的成功,反哺了科技创新的发展,也为深圳全面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营造了巨大空间。

作为东方大国,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外部世界不封闭、不盲从。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是对西方现代化资本驱动逻辑的根本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回望过去,深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展望未来,深圳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历史重任,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中国式现代化再启新篇,一定会续写出更多更美的“春天的故事”。

参考文献:

- [1] Tilly C. Core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 A.D. 990-1992[M]. Wiley-Blackwell, 1993, pp. 22.
- [2] 李培林. 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12): 4-21+199.
-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4] 倪星, 郑崇明, 原超. 中国之治的深圳样本: 一个纵向共演的理论框架[J]. 政治学研究, 2020, (4): 15-26+125.
- [5] 唐磊. 深圳国际城市形象: 域外“专家意见”与“大众感知”[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2): 41-49.
- [6] 谢志岩, 李卓. 深圳模式: 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理论阐释[J]. 深圳社会科学, 2019, (1): 97-110+159.
- [7] 罗清和, 张畅. 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四区叠加”的历史逻辑及经验启示[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2): 32-40.

作者: 倪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 熊哲文